沈阳故宫博物院凤凰楼圣容像存贮探微 *

杜　望　任万平

内容提要　沈阳故宫博物院凤凰楼是清朝在盛京皇宫尊藏历代皇帝圣容像之所。自乾隆十五年“五代圣容”入藏凤凰楼后，清朝历代皇帝都会将先帝圣容像移至凤凰楼尊藏。但光绪二年因凤凰楼需要修缮，一应陈设品均移贮敬典阁，后再未移回。本文根据《实录》、档案、近代报刊等资料，探究了圣容像在留都盛京的入藏和流转情况，并尝试还原凤凰楼部分旧藏。

关键词　凤凰楼　圣容像　存贮　沈阳故宫博物院

凤凰楼是沈阳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沈阳故宫”）最高的建筑，位于崇政殿之后、清宁宫之前，是一座进深、面宽均为三间的三层歇山琉璃瓦顶楼阁。此前已有学者考辨了凤凰楼的建筑年代及其与“翔凤楼”的关系，介绍其形制和功用演变‹1›；并利用《实录》《盛京通志》及辽宁省档案馆藏满汉文史料，探究凤凰楼的收藏情况‹2›。圣容像，即封建时代对皇帝画像的敬称，学界在考察其奉安制度时，也曾涉及到尊藏处所凤凰楼‹3›。不过有些问题仍未解决，如凤凰楼圣容像存贮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圣容像究竟如何分布和摆放？光绪二十六年（1900）沙俄趁八国联军侵华之机占领东北，沈阳陷落，这期间圣容像又

*　本文系故宫博物院第二期开放课题“故宫博物院院藏几组清代人物画像的历史考察”的成果，本项目得到龙湖－故宫文化基金、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公益资助。

‹1›　王佩环《沈阳故宫凤凰楼建筑年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4期，第91－94页；邹兰欣《乾隆第一次东巡盛京驻跸处考——兼析沈阳故宫凤凰楼和翔凤楼之殊异》，《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3期，第92－96页；赵彦昌、王睿嘉《〈黑图档〉中的盛京皇宫凤凰楼》，《北京档案》2021年第9期，第46－48页。还有部分论著是有关凤凰楼建筑结构、历年修缮情况的研究，因与本文无甚关联，兹不赘述。

‹2›　姜相顺、佟悦《盛京皇宫》，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第54－59、354－357页；于颖《盛京宝藏 宫中档册——清代中晚期盛京皇宫原藏文物清册及其文化价值》，《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辑，中华书局，2008年，第84－87页。

‹3›　徐广源《清帝圣容供奉制度初探》就清朝圣容供奉制度的创立、完善以及京师以外避暑山庄、盛京等地圣容像的供奉、尊藏作了初步探讨。载戴逸主编《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54－361页；徐瑾《清代皇帝御容安奉制度探析》认为“自乾隆朝皇帝驾崩后，历代帝后御容皆需随实录、玉牒等送至盛京凤凰楼安奉”。此观点似有不确，因为凤凰楼未曾入藏过皇后容像。载《故宫学刊》总第14辑，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203页。

去了何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凤凰楼的收藏沿革，尝试对其所藏圣容像的情况进行部分还原。

一　凤凰楼圣容像存贮沿革

1. 乾隆朝：始贮

凤凰楼在皇太极时期，主要用于议事、筵宴、小憩。顺治朝迁都北京后，凤凰楼长期处于闲置状态，直至乾隆八年(1743)，“特念奉天为国家发祥之地，《实录》为列圣纪事之书，命各缮满汉文一部送至盛京尊藏”。礼部官员提议将“高敞壮丽”的凤凰楼作为实录贮藏地，获得了皇帝允准‹1›。同年十月，乾隆帝东巡盛京祭祖时进行实地考察，赐随从王、大臣宴于凤凰楼前〔图一〕‹2›。

九年三月二日，乾隆帝令内大臣海望将“体仁阁所有尊藏五代圣像恭请至内廷瞻仰”，随后决定将太祖、太宗、顺治、康熙、雍正五位先祖“圣像各奉一轴同《实录》送至盛京供奉”‹3›，可见凤凰楼最初入藏的五幅圣容像来自体仁阁，同时亦有《实录》送达盛京。两年后，十方原存于北京皇宫交泰殿的御宝入藏凤凰楼‹4›。

此前学界普遍认为《实录》与圣训同时由京师送至凤凰楼是在乾隆十五年‹5›，但未能明确更具体的时间。据档案记载，此次送至盛京的有圣容像、《实录》《圣训》和玉牒，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四日从京师启程‹6›，二十八日至盛京，十二月三日奉安完毕‹7›。其时将实录、圣训存于凤凰楼上层金柜中‹8›，圣容像则置于金柜之上‹9›。

‹1›　《清高宗实录》卷一九六，乾隆八年七月丙戌，第11册第519—520页。本文所引《清实录》皆为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1986年出版(以下不一一注明)。

‹2›　前揭《清高宗实录》卷二〇二，乾隆八年十月庚戌，第11册第595页。

‹3›　《奏报恭送圣像及实录圣训玉牒至盛京仪注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合编《清宫内务府奏销档》第39册，故宫出版社，2014年影印本，第27页。

‹4›　前揭姜相顺、佟悦《盛京皇宫》，第356—357页。十宝各有一匣盛放，据道光年间嵩惠查奏，凤凰楼“中层尊藏宝十颗”，《为盛京内务府查点宫殿供奉尊藏册宝圣容等项数目俱各相符一折抄单事致内务府等》，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咨文，05-13-002-000138-0099号，本文所引清代档案均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5›　前揭姜相顺、佟悦《盛京皇宫》，第355页；王爱华、丁海斌《清盛京皇宫档案收藏概述》，《档案学研究》1992年第3期，第84页；王景丽《清代盛京崇谟阁贮藏实录圣训探究》，《民族古籍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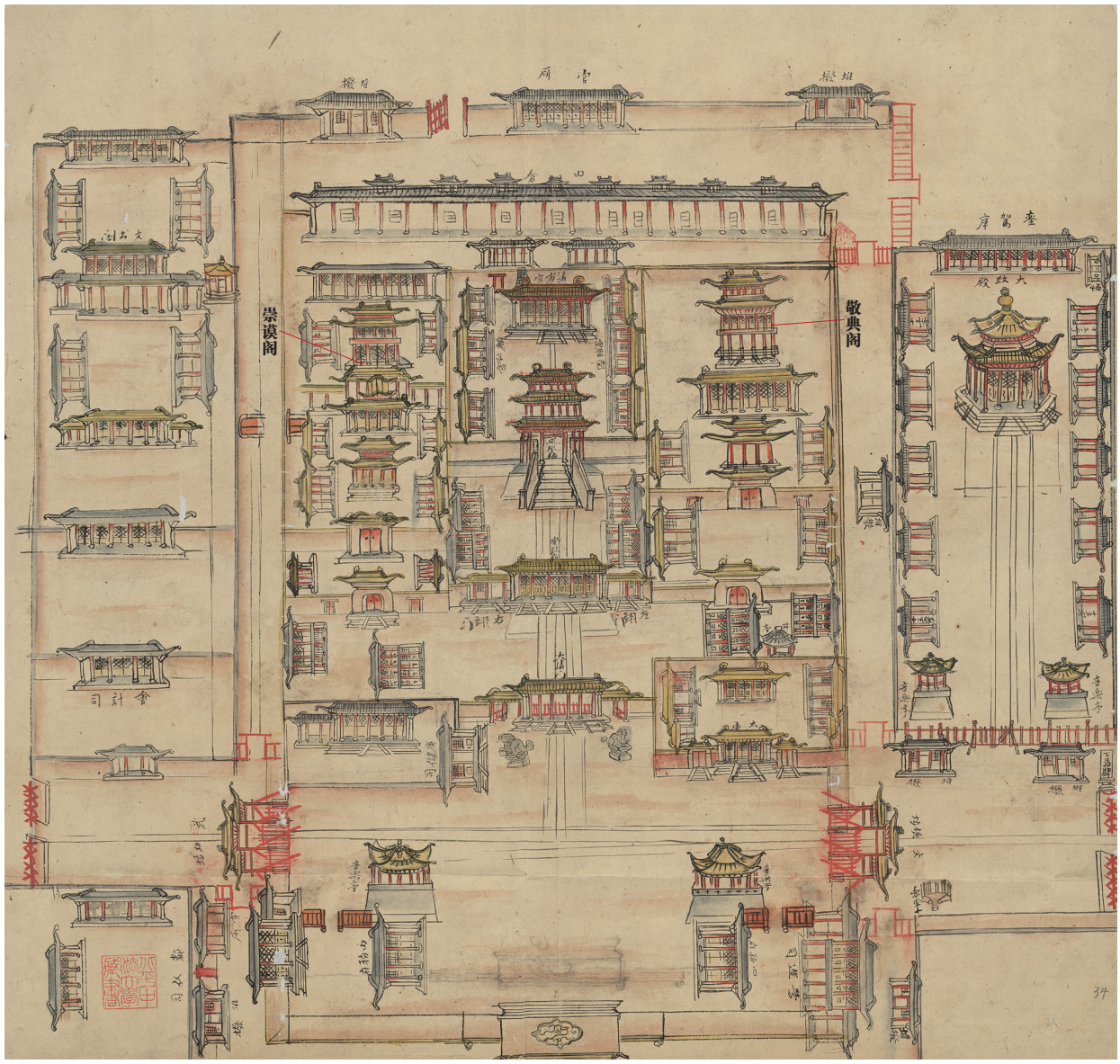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乾隆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第488页。

‹7›　图尔泰《奏报接奉圣容等并回署安奉日期事》，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批奏折，04-01-12-0078-021号。

‹8›　凤凰楼上层金柜十五顶，中层十五顶，《实录》《圣训》占了上层金柜中的十一顶，弘晌《奏为遵旨详酌在崇谟阁安列金柜以供贮实录折》，乾隆四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2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影印本，第728页。

‹9›　前揭《奏报恭送圣像及实录圣训玉牒至盛京仪注片》：“恭捧圣像诣凤凰楼供奉，于《实录》格上敬谨尊藏，以垂永久。”第22页。

〔**图一**〕《**盛京皇宫地盘立样全图**》
故宫博物院藏
箭头所示，为笔者所加



四十三年，乾隆帝忽然想起此前建造的敬典、崇谟二阁“原为留都金匮石室之储……而崇谟阁现在空闲，与建阁命名之义殊未相称”[1]，令盛京将军弘晌于本年六月十日将五朝圣训、实录从凤凰楼移贮崇

‹1› 前揭《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五四，乾隆四十三年四月辛丑，第22册第88页。

〔图二〕清人绘《乾隆帝朝服像》轴　故宫博物院藏



谟阁‹1›。四十七年三月‹2›，侍郎荣柱亦移送“未装潢圣容二轴，行乐图六轴”至盛京，次年乾隆帝东巡，又留下“已装潢圣容二轴，行乐图四轴”，合计十四轴，分装在三个箱子内，置于崇谟阁金柜之上‹3›。至乾隆末年，凤凰楼藏有五代圣容像和十方御宝。上层、中层金柜各十五顶，俱为空闲‹4›。

2. 嘉庆至同治朝：变通

乾隆帝去世后，嘉庆帝开始考虑“第六代皇帝圣容”的问题。由于乾隆帝生前已先后将自己的四幅圣容像、十幅行乐图送至盛京‹5›，嘉庆帝决定将其中一轴，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绘成并已装潢的“御薰貂朝冠皮镶边朝服”圣容像〔图二〕‹6›从崇谟阁移入凤凰楼‹7›，并于嘉庆四年(1799)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时完成移贮‹8›。

七年后，在乾隆朝实录、圣训准备入藏崇谟阁时，嘉庆帝考虑到“金柜内现尊藏列祖列宗实录圣训，今顶上供奉高宗纯皇帝圣容，未为妥协”，决定将藏于崇谟阁的三箱圣容像、行乐图“移请供奉于凤凰楼，以昭虔敬”。盛京将军富俊对此提出疑问，因行乐图中有侍从臣仆，而“凤

‹1› 弘晌《奏报将凤凰楼尊贮五朝圣训实录恭捧移请于崇谟阁上金柜内日期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朱批奏折，04-01-38-0012-016号。

‹2› 索诺穆等《奏报遵旨将送到圣容与正珠等物敬谨收贮事》，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1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6年影印本，第252页。

‹3› 富俊《奏为遵旨移请崇谟阁高宗圣容至凤凰楼并崇谟阁尊藏实录圣训等情形敬拟移请事》，嘉庆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朱批奏折，04-01-38-0025-015号。

‹4› 富俊《奏为查明凤凰楼金柜尊藏圣容及玉牒黄档等情形并筹划归并安置事》，嘉庆十一年五月一日朱批奏折，04-01-38-0025-014号。

‹5› 琳宁《奏请高宗纯皇帝圣容供奉凤凰楼事》，嘉庆四年八月十六日录副奏折，03-2158-00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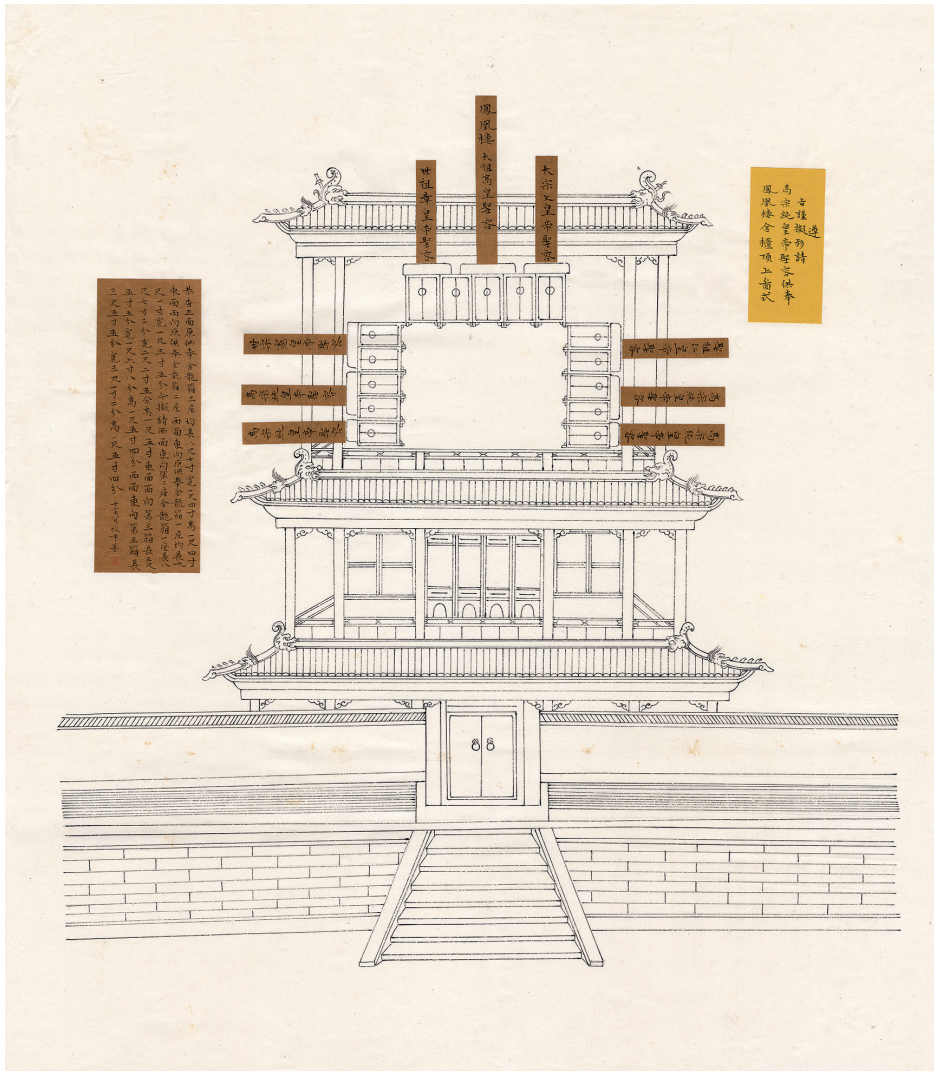
‹6› 这幅乾隆帝画像的参考号为“咸三〇二图像259”，其着装与档案记载相符，乾隆帝的样貌亦与绘制时间相符，疑为嘉庆帝移送的“第六代圣容”，论证详后。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册，嘉庆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307页。

‹8› 琳宁《奏为恭请乾隆四十一年朝服圣容于凤凰楼内金柜顶上供奉事》，嘉庆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朱批奏折，04-01-02-0141-025号。

凰楼供奉六朝圣容均系一轴御朝冠朝服”，“似未便一并移请供奉”。但嘉庆帝认为，有“侍从臣仆”更不适合置于实录、圣训之上，放入专门供奉圣容像的凤凰楼更妥，不必拘泥于数量‹1›，遂于十一年六月八日辰时完成移贮‹2›。至此，凤凰楼上层藏有包括乾隆帝在内的六代清帝各一轴标准圣容像，以及乾隆帝另外的十三轴圣容像与行乐图，共计十九轴，分置于九个金龙箱内〔图三〕‹3›。

〔图三〕嘉庆十一年清帝圣容像存放示意图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呈移请高宗纯皇帝供奉凤凰楼金柜顶上图式》摹绘



此后四十年，凤凰楼经历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修缮‹4›，但存贮情况没有变化。直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经大臣耆英提醒，道光帝才下谕：“盛京凤凰楼应行尊藏皇考仁宗睿皇帝圣容，俟恭送玉牒时一并敬谨送往尊藏。”‹5›两年后，续修玉牒和嘉庆帝圣容像于四月七日从京师启程，二十六日抵盛京，二十七日午时举行存贮仪式‹6›。

‹1› 前揭《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1册，嘉庆十一年五月九日、六月一日，第356、430－431页。

‹2› 富俊等《奏为遵旨奉移高宗纯皇帝圣容等尊藏供奉礼成事》，嘉庆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朱批奏折，04-01-14-0049-041号。

‹3› 《呈移请高宗纯皇帝供奉凤凰楼金柜顶上图式》，嘉庆十一年图式，03-1609-071号。此图虽为“拟定”图式，但随后即获得嘉庆帝允准，能够反映移贮后的实际情况。

‹4› 分别是在嘉庆二十一年、道光二十年。张杰《凤凰楼建筑图样研究》曾梳理过凤凰楼历代修缮情况，载《清前历史与盛京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718－724页。

‹5› 前揭《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1册，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三十日，第89页。

‹6› 全龄等《奏为奉命恭送玉牒圣容至盛京尊藏供奉礼成事》，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朱批奏折，04-01-14-0064-040号。

〔图四〕清人绘《道光帝几暇时乘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道光帝在九年(1829)东巡时，曾留有“御题‘几暇时乘’圣容一轴”〔图四〕[1]，供奉于保极宫东次间。道光帝去世后，盛京将军奕兴奏请将这幅圣容像移至凤凰楼存贮。由于凤凰楼上层已有十个金龙箱，“并无空闲处所”，再请将此轴置于“凤凰楼中层北面正中金柜顶上供奉”，获新帝咸丰允准后，于道光三十年六月十九日卯时完成移贮[2]。咸丰帝还特意令礼部拟定“圣容供奉盛京凤凰楼礼节”[3]，在咸丰元年(1851)十月将另外绘制的道光帝圣容像单独送至盛京[4]。经商议，该圣容像置于凤凰楼中层“正中金柜顶上供奉”，“御题‘几暇时乘’圣容至偏左金柜顶上供奉”[5]。

咸丰八年(1858)，随着前朝实录、圣训编纂完成，再次启动入藏盛京程序。九月十二日辰刻启行，十月一日抵盛京城外，五日巳时入藏完毕[6]。此次移送的物品除了玉册、玉宝、实录、圣训、玉牒，还有一幅嘉庆帝圣容像。依照前例，在乾隆帝一次性供奉“五代圣容”后，历代皇帝只需移送上一代皇帝圣容像入藏即可，为何咸丰帝在元年移送其父道光帝圣容像后，又要再次移送祖父嘉庆帝的圣容像呢？原来，当年道光帝送至盛京的嘉庆帝圣容像，其实是一幅行乐图——《春苑展书图》〔图五〕[7]，尽管凤凰楼所藏早已是圣容像与行乐图并存，但随着道光帝圣容像入藏，嘉庆帝成为唯一一位没有“标准”圣容像的皇帝。虽然最早的五代皇帝均没有行

‹1› 道光帝及下文的嘉庆帝行乐图，内藤湖南在1905年参观敬典阁时拍有照片，与故宫博物院藏清人绘《道光帝几暇时乘图》轴、清人绘《嘉庆帝春苑展书图》轴相符，可以确定就是这两幅。参内藤虎次郎《满洲写真帖》，东京：东阳堂，1908年。

‹2› 奕兴《奏为保极宫尊藏御题“几暇时乘”圣容轴可否恭请凤凰楼中层北面正中金柜顶上供奉请钦定事》，道光三十年四月二日朱批奏折，04-01-14-0066-064号；《奏为供奉大行皇帝御题“几暇时乘”圣容轴至凤凰楼礼成事》，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朱批奏折，04-01-14-0066-020号。

‹3› 《清文宗实录》卷三九，咸丰元年八月庚申，第40册第538页。

‹4› 载垣等《奏为恭送宣宗成皇帝圣容至盛京凤凰楼供奉礼成事》，咸丰元年十月十九日录副奏折，03-4172-037号。

‹5› 奕兴等《奏为钦遵吉期恭请宣宗成皇帝圣容至崇政殿安奉礼成事》，咸丰元年十月十九日录副奏折，03-4172-039号。

‹6› 庆祺《奏为遵旨陈明仁宗睿皇帝圣容恭送盛京凤凰楼供奉处所请钦定事》，咸丰八年五月二日朱批奏折，04-01-14-0068-044号；绵勋等《奏为奉旨恭送仁宗睿皇帝圣容至盛京供奉尊藏等礼成事》，咸丰八年十月五日录副奏折，03-4176-036号。

‹7› 柏葰等《奏为宣宗成皇帝圣容送往盛京供奉礼节及一切事宜可否会同礼部酌拟章程等请旨事》，咸丰元年八月二日朱批奏折，04-01-15-0052-008号。

乐图，但贮藏圣容像是凤凰楼在乾隆帝时确定的功能，更加生动活泼，甚至带有侍从臣仆的行乐图只是附属。故咸丰帝此次移送时，专门加入了嘉庆帝圣容像。

这幅圣容像如何存贮，又费了一番心思。此前因上层已无存放空间，道光帝圣容像和行乐图均置于中层。当时凤凰楼上层有十箱画像，其中北面三箱，东面四箱，西面三箱，“西面金龙柜顶上有空余处所，然仅五尺，不敷供奉”。对此，盛京将军庆祺建议[1]：

> 将东面向西“高宗纯皇帝行乐”一箱四轴，恭请在西面向东第二箱“高宗纯皇帝行乐”箱内尊藏，将空箱撤下，并请将西面向东第三箱“玉［御］容玻璃挂屏行乐”一箱，移请在东面向西供奉。连空余处所，共得八尺四寸，方敷供奉。

即将原有的三箱乾隆帝行乐图合并为两箱，从而腾出位置放嘉庆帝圣容像。经过一番调整，凤凰楼上层仍是十个金龙箱，共二十一轴画像[2]。

同治元年（1862）已绘制好咸丰帝圣容像[3]，但直到咸丰朝《实录》《圣训》及续修玉牒陆续完成，才重启咸丰帝圣容像移送盛京的程序[4]。同治七年九月二日启程，二十一日抵盛京城外，次日未时，将“文宗显皇帝圣容于中层北面中右金龙柜顶上供奉”[5]。

〔图五〕清人绘《嘉庆帝春苑展书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1› 前揭庆祺《奏为遵旨陈明仁宗睿皇帝圣容恭送盛京凤凰楼供奉处所请钦定事》。

‹2› 分别是“七代圣容”、乾隆帝圣容像和行乐图十三轴、嘉庆帝行乐图一轴。

‹3› 造办处如意馆《为绘画托裱恭绘盛京热河供奉文宗显皇帝圣容轴像差竣停止匠役等盒饭等项事》，同治元年闰八月八日，05-08-030-000431-0042号。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7册，同治六年十一月七日、十九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341、367页。

‹5› 佛尔精额《为报明供奉文宗显皇帝圣容实录圣训玉牒至盛京尊藏礼成事致总管内务府》，同治七年十月六日咨文，05-13-002-000075-0190号。

〔图六〕**敬典阁圣容像存放示意图**
（依据《盛京将军增祺等造具俄兵撤退后太庙供奉玉册、玉宝数目清册之奏折》内容绘制）奏折见《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82页



3. 光绪朝：流徙

光绪二年（1876），由于凤凰楼年久失修，“下层外面墙角裂缝各长一丈三四尺，宽四五分不等，地脚微有沉陷”[1]，状况岌岌可危。经过请示，楼内所藏圣容像于六月二日全部移贮敬典阁[2]。因修缮而暂时移存他处的情况本来很常见，但此次移贮后，原置于凤凰楼的圣容像再没有移回。按光绪五年苏勒布奏折，“九代圣容”及四箱圣容像、行乐图置于敬典阁上层[3]。凤凰楼原有的三十个金柜则全部移至敬典阁下层[4]。次年九月二十二日，同治帝圣容像与《实录》《圣训》、册宝、续修玉牒从京师起程[5]，十月十一日抵盛京城外，于十四日午时“恭请穆宗毅皇帝圣容于敬典阁上层正面第一金龙柜顶上供奉”[6]，完成入藏。值得注意的是，盛京将军增祺曾在奏折中提到过敬典阁上层圣容像的摆放情况〔图六〕。

根据该奏折，圣容像在敬典阁的摆放仍大致依照历代皇帝的顺序。光绪二年之后近二十年，圣容像、行乐图的存贮地一直在敬典阁未变[7]。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俄国趁机出兵中国东北，从黑龙江畔中俄边界进入，一路南下，于闰八月八日占领奉天。奉天失守前，盛京副都统晋昌曾令盛京户部侍郎清锐“赶将圣容御宝敬谨装裹，以备紧急护奉出省”。闰八月

‹1› 崇实等《奏陈敬典阁奉移圣容等折》，光绪二年三月二十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3年影印本，第190页。

‹2› 崇实等《奏为遵照吉期恭请列圣圣容供奉敬典阁礼成事》，光绪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录副奏折，03-5525-085号。

‹3› 《申报》1880年1月5日第3版。

‹4› 盛京将军衙门《凤凰楼原设金龙柜尺寸清单》，光绪十三年，06-01-001-000791-0213号。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六册，光绪六年八月四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183—184页。

‹6› 歧元《奏为供奉玉册玉宝等尊藏依次成礼事》，光绪六年十月十四日朱批奏折，04-01-14-0080-023号。

‹7› 见《申报》1882年6月21日第10版；1884年7月27日第9版；1888年8月23日第12版；1889年4月26日第11版；1890年7月22日第12版；1895年9月4日第14版；1899年9月8日第14版。

七日，晋昌放弃抵抗并出城‹1›：

> 途遇清锐，始知圣容御宝因无兵力尚未请出。奴才（笔者注：晋昌）立即飞督奋勇员兵，赶即折回，星急冒死撞进城内，于枪林炮雨中，仰托天佑，抢护出省，恭奉以行。

十二月时晋昌驻扎在蒙古草原库噜王旗地方（今内蒙古库伦旗），并将圣容像供奉于当地敕赐的兴源寺‹2›。据十月二十五日上谕，清廷曾寄希望于战争过后将圣容像送回‹3›：

> 现在东三省俄人已许交还，所有请出之圣容御宝，着敏鲁布札布罗卜藏喇西敬谨供奉。俟盛京收复后，即行恭送还省。

但不久清廷就改变了主意，因俄兵已开始“袭攻库噜”，清廷为促成和局，采取不抵抗政策，遂令“候补主事桂昌等护奉西行，现已护送至东翁牛特旗贝勒华廷府中暂行供奉”，因该地方辽旷，恐有疏漏，又决定将其转至热河：“当此时艰，又兼马贼溃勇肆起纷扰，该地方文武各官及蒙古盟长王贝勒等，均能深明大义，长途恭护，敬谨将事，各尽臣子之职。”‹4›圣容像等在二十七年三月六日抵热河，暂供外八庙之一的普宁寺‹5›。九日午刻移圣容像“在澹泊敬诚殿敬谨供奉”，此次共转移“列圣圣容十轴、御宝十方、御刀五柄”‹6›，“圣容十轴”即从努尔哈赤到同治帝“十代清帝圣容”，行乐图等不在其内。三十二年在《申报》登载的《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中‹7›：

> 杨（笔者注：杨儒）云……兹有一事奉恳，盛京系我国家发祥之地，历代圣容及御用车服、宝器、书籍均藏于此，务祈奏请贵国大皇帝饬谕武员派兵看守，代为保护，勿使损坏遗失为要。

一个月后，《申报》又专门刊登了一条消息，称“盛京行宫虽遭兵燹，而库藏列祖列宗圣容及重器宝物幸皆无损”‹8›，当时十代圣容像早已存贮热河，此处“圣容”当指未及转移的四箱圣容像和行乐图。对照三十三年奉天总督徐世昌抄送内务府盛京皇宫“恭存陈设等项清单”‹9›，其中仅提到十代圣容像和御宝在

‹1› 《盛京副都统晋昌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7辑，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718—719页。

‹2› 晋昌《奏报各蒙藩王旗叩祭圣容日期事》，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录副奏折，03-5400-099号。

‹3› 前揭《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六册，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第419页。

‹4› 梅谦《奏为迎请列圣圣容等物到热敬谨供奉日期事》，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录副奏折，03-5567-040号。

‹5› 恒启《奏陈迎请圣容供奉尊藏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4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4年影印本，第81页。

‹6› 前揭梅谦《奏为迎请列圣圣容等物到热敬谨供奉日期事》。

‹7› 《申报》1906年3月12日第4版。

‹8› 《申报》1906年4月4日第9版。

‹9› 《奉天行省总督徐世昌为抄送内务府恭存陈设等项清单事札内务府档房》，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八日，前揭《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第85页。

光绪二十六年移送至热河，其余四箱画像仍在敬典阁。

另据《东方杂志》1910年刊载的行记中称："闻列朝御容皆送往热河，惟纯庙御容尚在。有一巨幅，纯庙朝服坐，神气生动，包裹亦极谨严，无纤毫积尘。"[1]由于尚未看到四箱圣容像、行乐图何时被转移的其他史料，如果《东方杂志》记载可信，转移时间当在1907(即光绪三十三年)—1910年之间。

二　凤凰楼贮藏圣容像蠡测

现存档案中有一份乾隆帝十三轴圣容像、行乐图清单[2]：

高宗纯皇帝圣容三轴：

薰貂冠皮镶边朝服一轴（乾隆元年），未装潢

御盔甲乘马一轴（乾隆十年），未装潢

清凉冠夹朝服一轴（乾隆三十八年），装裱成轴

高宗纯皇帝行乐图十轴：

行乐图一轴（乾隆元年）

行乐图一轴（乾隆三年）

行乐图一轴（乾隆十一年）

行乐图一轴（乾隆三十九年）

行乐图一轴（无年份）

行乐图一轴（无年份）

游戏黄庭手卷一卷（壬辰年）

威弧获鹿手卷一卷（无年份）

春原阅骏手卷一卷（无年份）

玉［御］容玻璃挂屏一面（无年份）

这份清单中所录部分行乐图不著录具体内容，只有时间。而光绪二十九年盛京将军增祺在奏折中对敬典阁藏清帝圣容像、行乐图有过具体的描述[3]，与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寿皇殿》[4]第283号红漆长木箱中的十幅画像进行对比，名称高度相似，三者之间相互比对印证，可以明晰一些画作的具体问题[表一]。

‹1›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六期《附录第四　行纪》，1910年6月，第26页。

‹2› 《呈高宗纯皇帝圣容图等清单》，嘉庆十一年清单，03-1609-065号。

‹3› 前揭《盛京将军增祺等造具俄兵撤退后太庙供奉玉册、玉宝数目清册之奏折》，第82—83页。

‹4›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10辑，线装书局，2004年，第226—227页。

［表一］**凤凰楼藏部分清帝画像相关信息一览表**

序号	凤凰楼藏清帝圣容像、行乐图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283号红漆长木箱	故宫文物相关编号	备注
1	春原阅骏图	姚文瀚绘春元[原]阅骏图手卷(附黄锦套)	咸二八三1，咸字参考号为贮于寿皇殿文物，资绘画146。	
2	清凉冠夹朝服像	清凉冠夹朝服康熙圣容(附黄锦套)	咸二八三2图像422，故6397。	
3	威弧获鹿手卷	威狐[弧]获鹿手卷(附黄锦套玉扣三个)	咸二八三3图像481，故9205。	
4	仁宗行乐春苑展书图	春苑展书图(黄绫套一玉柱头)	伟七三七一图像410，伟字号为故宫文献馆文物南迁时所给编号，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文物时漏编号文物，故6363。	
5	圆光半身行乐挂轴	万宗半身行乐图	咸二八三5图像360，故6518。	虽名称表面上无法完全吻合，但通过字体书写情况可以判断。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文物时皆为手写草书，其“萬”与“高”字有时比较相像，比如米芾体所写的“萬”字与“高”非常接近，在从手写体转录为印刷体时出现了误录。所以，万宗即高宗。
6	游戏黄庭手卷	游戏黄庭手卷(黄锦套金镶玉轴玉扣三)	咸二八三6，故248020。	
7	宣宗行乐几暇时乘图	宣宗行乐几暇时乘(黄锦套玉轴)	咸二八三9图像310，故6565。	
8	薰貂冠皮镶边朝服像	薰貂皮镶边朝服(黄锦套无轴)	咸二八三6图像418，故6467。	
9	古制衣冠行乐图	古制衣冠行乐图(黄锦套无轴)	咸二八三9图像231，故6477。	弘历古装行乐图。
10	岁朝行乐图	岁时行乐图(黄锦套无轴)	新13904	
11	万国朝贺图		伟七三九八图像428，故6273。	天一〇三二图像452，故6271；伟七四〇二图像665，故6272；咸一30图像227，故6504目前故宫博物院均命名为《万国来朝图》。
12	元宵行乐图		天九九八图像314，故6474，命名为《高宗元宵行乐图》。	这两幅无法确定，仅通过名称作初步推断。
13	观月行乐图		天九九二，故6517，命名为《高宗观月行乐图》。	
14	御容玻璃挂屏一面			据内藤湖南记述，该屏已损毁。
15	御盔甲乘马像		天一三五〇图像416，故8746。	天一三四九图像472，故6488，命名为《高宗盔甲乘马图》轴；《点查报告》还有天一三五四《御盔甲乘马图》[1]。

凤凰楼所藏四箱圣容像和行乐图，除嘉庆帝、道光帝各有一轴外，其余均为乾隆帝圣容像，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283号红漆长木箱中的第二轴著录为康熙帝圣容像，尽管所述服饰相同，但在人物的确定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记载为乾隆帝，而从下述可知《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记载失误。日

‹1› 前揭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一辑，第154页。

〔图七〕《清高宗纯皇帝清凉冠夹朝服图》
采自内藤湖南《满洲写真帖》，东阳堂，1908年



〔图八〕清人绘《康熙帝朝服像》轴
故宫博物院藏



本学者内藤湖南在1905年8月30日参观敬典阁时留下了文字记录及照片‹1›，其中就拍摄了《清凉冠夹朝服像》〔图七〕。

此画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文物档案著录名为清人绘《康熙帝朝服像》轴〔图八〕，此前已有学者指出，该图所绘人物实为乾隆帝‹2›。其名称被弄错，应始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过程中命名错误，进而影响了今人的判断。经此核对，这箱画基本能够与凤凰楼旧藏对上。而在同治二年(1863)《寿皇殿尊藏圣容黄册》中，未见《嘉庆帝春苑展书图》《道光帝几暇时乘图》《威弧获鹿手卷》，仅见同名的《春原阅骏图》一幅‹3›，不过此图现有三个版本，它确实存在副本的情况‹4›。但《嘉庆帝春苑展书图》《道光帝几暇时乘图》《威弧获鹿手卷》全部都有副本的情况概率极小。几乎可以推断，283号红漆长木箱所藏即是遭兵燹后盛京行宫库藏画像。

‹1› ［日］内藤湖南《游清第三记：1905年的奉天宫殿调查》，钱婉约译《中国访书记》，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63－64页。

‹2› 房宏俊《清代皇帝朝服章纹专题(下)——从清代十二章纹样的出现看一幅"康熙"朝服像的断代》，《紫禁城》2009年第3期，第100－107页；宋俊巍、橘玄雅《故宫博物院藏〈玄烨朝服像〉的再探讨》，《紫禁城》2020年第2期，第122－133页。

‹3› 《寿皇殿尊藏圣容黄册》(同治二年)，朱赛虹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第41册，故宫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89页。

‹4› 详见聂崇正《三幅〈春郊阅骏图〉卷的疑问》，《清宫绘画与画家》，故宫出版社，2019年，第76－83页。

〔图九〕清人绘《游戏黄庭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有两幅，落款分别为壬辰年、癸巳年，结合档案记载，藏于凤凰楼的是壬辰款



〔图十〕清人绘《威弧获鹿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这批圣容像和行乐图中“咸”字号占了大部分，“咸”字号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文物时对寿皇殿存贮文物的编号。寿皇殿为清室所属，因而亦被认作故宫旧藏。1914年，位于故宫前朝区域的古物陈列所成立时，曾集中将盛京皇宫和热河行宫所藏文物运至新建的宝蕴楼存放，这些画像既然没有入藏宝蕴楼，其运回京城的时间估计要早于1914年。移贮的具体时间和细节，因尚未看到相关史料，只能留待以后考察。

据内藤湖南记述，当时《御容玻璃挂屏》已经损毁，《熏貂冠皮镶边朝服图》和《元宵行乐图》他没有看到，“其他的全都得以浏览”[1]。在看到的十二幅画像中，他拍摄了六幅，除了嘉庆、道光两帝的行乐图，以及上文提到的《清凉冠夹朝服像》，还有三幅乾隆帝“行乐图”画像，分别是《游戏黄庭图》卷〔图九〕《威弧获鹿图》卷〔图十〕和《御盔乘马图》〔图十一〕。

故宫博物院藏清人绘《乾隆帝戎装骑马像》轴〔图十二〕，此前已有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过探讨，多认为此轴绘于乾隆四年(1739)大阅前后[2]。但李湜结合档案和画作本身，推断出原认为佚名绘油画《乾隆帝骑马像》〔图十三〕，实际是郎世宁于乾隆六年所画，用于悬挂在京师南苑行宫新衙门，而清人绘《乾隆帝戎装骑马像》轴则为油画本翻版，“虽然表现的是弘历南苑大阅之姿，但其绘制目的应该不同于直接贴

‹1› ［日］内藤湖南《奉天宫殿所见图书》，前揭《中国访书记》，第97页。

‹2› 聂崇正《两幅〈乾隆戎装像〉》，《紫禁城》2010年第12期，第74—77页；马雅贞《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45—146页。

〔图十一〕《清高宗纯皇帝御盔甲乘马图》
采自前揭《满洲写真帖》



〔图十三〕佚名绘油画《乾隆帝骑马像》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二〕清人绘《乾隆帝戎装骑马像》轴
故宫博物院藏



裱在新衙门的油画本，它不是专门为南苑特制的画作”[1]。如果没有其他副本，现存清人绘《乾隆帝戎装骑马像》轴即是藏于凤凰楼的《清高宗纯皇帝御盔甲乘马像》，前述档案明确记载该像绘于乾隆十年，晚于相同题材的油画本，且后来用于贮藏，与李湜的推断相符。

《岁朝行乐图》在《满洲写真贴》上虽无照片，但内藤湖南记录了该画的题款：“乾隆戊午嘉平月奉敕，臣郎世宁、唐岱、陈枚、孙祐、沈源、丁观鹏恭画”[2]，与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郎世宁等绘《乾隆帝岁朝行乐图》〔图十四〕题款〔图十五〕完全一致，亦可确定此图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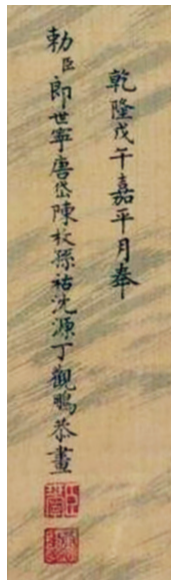
‹1› 李湜《佚名油画〈弘历骑马像〉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5期，第47—56页。

‹2› 前揭［日］内藤湖南《奉天宫殿所见图书》，第96页；另前揭《盛京皇宫》亦有类似描述，但未标明出处，第356页。

〔图十四〕郎世宁等绘《乾隆帝岁朝行乐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五〕《乾隆帝岁朝行乐图》题款



〔图十六〕清人绘《乾隆帝半身像》轴
故宫博物院藏



藏于凤凰楼。

由于《故宫物品点查报告》283箱的画作均可与原凤凰楼贮藏对应上，查故宫博物院藏参考号为“咸二八三”的画作，可进一步确定其他几幅圣容像和行乐图。如参考号为“咸二八三5”清人绘《乾隆帝半身像》轴〔图十六〕，所系布签上有“圆光半身”四字〔图十七〕，画套题签上书“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吉日”〔图十八〕，与“行乐图一轴（乾隆三十九年）”吻合，也即《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的“万宗半身行乐图”。此画乾隆帝面容已氧化发黑，与档案中“高宗纯皇帝圆光半身行乐脱粉”的描述相符，而且脱粉的情况在道光九年（1829）已经出现[1]。

〔图十七〕“圆光半身”布签



〔图十八〕清人绘《乾隆帝半身像》轴画套



参考号为“咸二八三6”清人绘《乾隆帝朝服像》轴〔图十九〕，该画是乾隆帝青年时的画像，应为档案所载“薰貂冠皮镶边朝服一轴（乾隆元年），未装潢”。只是为展示的需要，2006年已装裱。

参考号为“咸二八三9”的清人绘《乾隆帝岁朝行乐图》轴〔图二十〕，裱褙有黄签“古制衣冠”〔图二十一〕，即为原藏于凤凰楼的《古制衣冠行乐图》。

凤凰楼原藏“万国朝贺图”一幅，查阅故宫博物院藏四幅《万国来朝图》轴，只有参考

‹1› 前揭《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第82页。

〔图十九〕清人绘《乾隆帝朝服像》轴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十〕清人绘《乾隆帝岁朝行乐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十一〕清人绘《乾隆帝岁朝行乐图》轴裱褙局部



号为“伟七三九八”的《万国来朝图》轴〔图二十二〕，裱褙有黄签“万国朝贺”〔图二十三〕，当为此图无疑。

行乐图是有“场景”的，结合具体内容与相应名称，较容易判断。相比之下，找寻“十代圣容”的难度反而更大，因这些画作在记载中统称为“圣容”，很多只有服饰上的区别。如最早入藏的五代圣容像，着装分别是‹1›：

太祖高皇帝圣容，御清凉朝冠夹朝服；

太宗文皇帝圣容，御清凉朝冠夹朝服；

世祖章皇帝圣容，御清凉朝冠夹朝服；

圣祖仁皇帝圣容，御清凉朝冠夹朝服；

世宗宪皇帝圣容，御薰貂朝冠皮镶边朝服。

嘉庆帝为其父皇选定的圣容像是“御薰貂朝冠皮镶边朝服”。可见在前六代圣容像

‹1› 琳宁《奏请高宗纯皇帝圣容供奉凤凰楼事》，嘉庆四年八月十六日录副奏折，档号：03-2158-001。

中，雍正帝、乾隆帝着冬装，更早的四帝则是夏装。“十代圣容”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抵达热河后，恒启和色楞额先后提出，圣容像虽暂供澹泊敬诚殿，但“仅有黄缎内囊，并无尊藏外匣”‹1›，故“拟做楸木外匣十件，长八尺九寸至六尺四寸不等，均宽七寸，高六寸三分”‹2›。对比《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寿皇殿》相关记载，有木匣的皇帝圣容像有两组，一组是第286至292号：“乾隆皮朝服像、雍正皮朝服像、嘉庆朝服像、咸丰朝服像、同治朝服像、康熙朝服像、道光朝服像”，这一组主要是“清帝吉服读书像”，曾藏于避暑山庄绥成殿，徐瑾已进行过考察‹3›。另一组是第294到303号，分别是“文宗御容像、太宗御容像、世祖御容、圣祖御容、宣宗御容、穆宗御容、太祖御容、仁宗御容、高宗御容、世宗御容”‹4›，是从太祖到穆宗的十代清帝圣容像，在数量和名称上与原藏沈阳故宫的圣容像相符；且“自二九四至三〇三均带木匣”，特征亦相符。

〔图二十二〕清人绘《万国来朝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十三〕清人绘《万国来朝图》轴裱褙局部



由于历史原因，太祖努尔哈赤像于1959年外借给当年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余九幅现均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二十四至图二十六〕‹5›。通过对比，前六位皇帝的着

‹1› 色楞额《奏为遵旨恭备敬谨尊藏列圣圣容木箱事》，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附片，档号：04-01-14-0096-002。

‹2› 恒启《附陈恭做到列圣圣容外匣片》，《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4辑，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第635页。

‹3› 徐瑾《故宫博物院藏清帝吉服读书像考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8期，第81—91页。

‹4› 前揭《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10辑，第227—228页。

‹5› 按，顺治帝、康熙帝、雍正帝朝服像的故宫参考号分别为“咸二九六图像230”“咸二九七图像432”“咸三〇二图像241”，乾隆帝朝服像见〔图二〕。

〔图二十四〕清人绘《顺治帝朝服像》轴



〔图二十六〕清人绘《雍正帝朝服像》轴



〔图二十五〕清人绘《康熙帝朝服像》轴
（以上三幅画像均为故宫博物院藏）



装与档案记载均可对应上。这组圣容像与“清帝吉服读书像”编号接近，两组画像在清末均贮存于避暑山庄，或是在同一时期移送京师并入藏寿皇殿。

由于清帝画像所遗甚多，本文通过史料记载与故宫博物院藏实物进行对比考察，初步确定了部分曾存贮于凤凰楼的圣容像和行乐图的情况，尤其明确了几幅画像的时代问题。但还有一些问题没能解决，如凤凰楼旧藏画像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入藏寿皇殿？目前推断曾藏于凤凰楼的《戎装骑马像》，故宫参考号是“天字号”，说明其在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时藏于乾清宫，这幅画又是如何进入乾清宫的？抑或此画有另外的副本？郎世宁等绘《乾隆帝岁朝行乐图》原参考号应是“咸二八三10”，本为清宫旧藏，但故宫博物院却编为“新13904”字号，可见该图在点查工作结束后曾流出宫外‹1›，又通过国家文物局调拨再次回流故宫博物院，《故宫物品点查报告》里显示此画当时“无轴”，但它再次入宫时已装裱成轴，其装裱形式与皇宫当年的装裱所用裱边完全不同，采用橙色边，并用清宫虽使用但较少使用的象牙轴头。凤凰楼旧藏《元宵行乐图》《观月行乐图》《春原阅骏图》，仍难以与现存实物进行准确对照。要解决以上问题，还有待更多材料的发掘和论证。

因不便观瞻，清帝或许不会将其最心爱的画作移贮盛京。但清

‹1› 故宫博物院根据文物入藏情况给予两种编号，对原清宫旧藏文物编为“故”字；对1949年之后的新入藏品编为“新”字。

宫画作存在一画多制的现象，以乾隆帝为例，他会将部分卷轴的“副本”藏于凤凰楼，如目前能够确定的清人绘《乾隆帝戎装骑马像》轴、《乾隆帝游戏黄庭图》卷，均是相同内容有两幅画作。《戎装骑马像》分为油画本和绢画本，油画本悬挂于京师南苑，可时常观瞻，绢画本即可送至盛京贮藏。当然，存于盛京的也并非全是后出的摹本，《游戏黄庭图》卷两个版本的题款分别是壬辰年和癸巳年，凤凰楼所藏反而是先画成的壬辰本。此外，以“万国来朝”“行乐图”“岁朝图”为主题的画作均不止一幅，也给乾隆帝异地存贮圣容像留下较大的选择空间。

梳理目前已知曾藏于凤凰楼圣容像、行乐图，不难发现沈阳故宫对皇帝画像留存的重大意义：由于凤凰楼严格的存贮制度，如定期晾晒[1]、不用于悬挂和赏摹，使许多精美的画作得以完整地保存，即实现异地存贮，与现今异地存储数据具有同样的意义。凤凰楼的相关档案，为厘清部分清帝画像的绘制时间、考察其收藏源流提供了有力的材料佐证。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承蒙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李湜老师指导并提供相关资料；画家冯松先生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绘制了《呈移请高宗纯皇帝供奉凤凰楼金柜顶上图式》，谨致谢忱！

[作者单位：杜望，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任万平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圣容像自乾嘉时期即于“每年立秋后恭晾一次”，直至光绪二十五年，即“十代圣容”移出敬典阁的前一年，前揭琳宁《奏请高宗纯皇帝圣容供奉凤凰楼事》；《申报》1899年9月8日第14版。